

吳敬梓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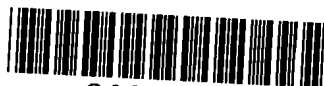
陈美林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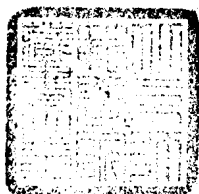
吴敬梓研究

陈美林

17643/28



20985939



上海古籍出版社

985939

吴敬梓研究

陈美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36,000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8,000

统一书号: 10186·497 定价: 1.35元

目 录

颜李学说对吴敬梓的影响·····	1
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对吴敬梓的影响·····	15
略论吴敬梓的“治经”问题·····	33
吴敬梓和戏剧艺术·····	49
吴敬梓和释道异端·····	63
吴敬梓和科学技术·····	79
吴敬梓身世三考·····	93
吴敬梓家世杂考·····	107
关于吴敬梓家世的几点辨正·····	115
关于吴敬梓应征辟问题·····	123
南京先贤祠的兴废及其与吴敬梓的关系·····	135
吴敬梓“秦淮水亭”考索·····	143
陈毅及其《所知集》中所涉及的有关吴敬梓交游资料·····	155
吴敬梓与甘凤池·····	169
康熙《全椒志》中有关吴敬梓先世资料·····	175
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197
论《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	227
吴敬梓笔下的盐典商人及其与文士之关系·····	255
关于《儒林外史》“幽榜”的作者及其评价问题·····	271

鲁迅与吴敬梓291

略评胡适对《儒林外史》的研究301

后记323

（此处为模糊的正文内容，无法准确转录）

颜李学说对吴敬梓的影响

历史上任何一种学说的产生，都是由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任何一种学说的产生，“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①因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②吴敬梓生活的时代虽然仍是封建社会，但已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这样的物质生产条件，对他进步思想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也从早于他的一些进步思想家的学说中汲取了有益的养料，特别是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颜元和李塨，对他的影响很大。兹就颜、李学说与吴敬梓思想的关系略作论说。

—

颜元(1635—1704)，字习斋，生活在明末清初，是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学生李塨(1659—1733)字恕谷，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在学术史上被称为颜、李学派。他们的时代略早于吴敬梓。

明代自中叶以来，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逐渐繁荣，在封建经济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城市市民阶层逐步形成。随之而来，就产生了封建官僚和市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农村中土地

兼并现象也日趋严重，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不断激化。阶级矛盾不但尖锐而且复杂。同时，民族矛盾也逐步上升，满族统治者在东北地区，对明王朝的领域蚕食鲸吞。此外，在汉族统治阶级内部，也是各派势力树党营私，相互倾轧，矛盾重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大起义终于推翻了明王朝。随即满族统治者武装进入关内，与汉族官僚地主相互勾结，攫夺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了清王朝。这一段时期内，不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激烈，思想领域内的斗争也非常尖锐。明朝统治者大力提倡宋元理学，前期是程、朱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占上风，中叶以后以陆、王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又逐步得势。但不论程、朱还是陆、王，他们都是空谈心性，不务实际，无益于国计民生。在这样的形势下，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从富国强民的目的出发，或批判程、朱，或驳斥陆、王，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颜、李学说也正是这种思潮的产物。他们不但批判程、朱，同时反对陆、王，对主、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一齐痛加驳斥。习斋大声疾呼：“今何时哉！普地昏梦，不归程朱，则归陆王，而敢别出一派与之抗衡翻案乎？”^③恕谷也斥责宋明理学亡国祸民，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④因而极力主张实践，反对浮言，讲求功利，谋取事功。颜逝世那一年还表示：“思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⑤李则经常斥责宋明理学家不务实际的恶劣作风，说：“道学不能办事，且恶人办事。”^⑥对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他也加以驳难，诘问哪有“用兵而不计兵之胜”、“耕田而不计田之收”^⑦的道理。他们为了反对空疏的理学，倡导务实的学风，对于我国固有的某些自然科学以及西洋传教士带来的一些西洋文明，也十分重视，并认真学习，例如习斋在二十二

岁时“学医”，三十五岁时“学习数，自‘九九’以及因、乘、归除，渐学‘九章’”，四十三岁时与“精西洋数学”的杨计公讨论学问，四十八岁时又从人学“天文之学”^⑧。恕谷也是如此，二十三岁时“读《步天歌》”，三十三岁时学“测天法”，四十八岁时向吴子淳“问西洋三角法”，六十二岁时至安徽宁国，应当时大数学家梅定九之邀，两人晤面，切磋学问^⑨；而梅定九治学，就能兼取中外，包涵古今，他曾说：“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⑩。正由于重视这些学科的学习，使得他们能够从富国强民的目的出发，在反对科举制度的同时，提出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一些具体意见。当然，他们提出的种种主张，其最终目的仍在于挽救封建王朝的厄运，强化地主阶级的统治。但由于他们受到新兴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影响，加之生活道路上的升沉浮降，从而接触到农村和城市各个阶层的人士，所以在他们的思想中存在着很多的进步成份，他们的主张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和新兴工商业者的利益与愿望。他们思想中的进步成份和落后糟粕，都对当时及后来不同的学者产生不同的影响。

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受到颜、李学说的影响很大。虽然颜、李都生活在北方，但恕谷却数次渡江而南。到了吴敬梓的青年时代，颜、李学说也已流传到南方。当康熙五十七年（1718）恕谷六十二岁时，看到“陶甄夫《秦关稿序》内有云‘颜李之说，数十年来，海内之士靡然从风’”，也曾惊叹：“岂南方信此道已众乎！”^⑪在颜、李之学广为流传的情况下，吴敬梓这样一个“涉猎群经诸史函”^⑫的好学青年，接受这一学说是极为自然的事。特别是吴敬梓还具有特殊的个人条件。首先，全椒吴氏和恕谷有着不同一般的关系，吴敬梓曾祖吴国对曾任顺天学政，康熙十六年主持府院试时将十九岁的青年李蟠录取为“县学生员第一名”^⑬。吴国对常以“敦孝悌、崇实学、正心术”^⑭教导士人，对恕

谷的思想也产生一定影响。他对恕谷的文章又深为喜爱，为之“开雕行世”^⑤，扩大它的影响。吴敬梓十分崇敬曾祖吴国对，因而对恕谷的文章、思想当早有接触。其次，吴敬梓的长子吴烺曾从湖北江夏人刘湘庵学历算之学，刘氏《答历算十问》即为吴烺而作。刘是宣城梅定九弟子，又是恕谷的门生^⑥，因而吴烺是恕谷的再传弟子。吴敬梓与其子吴烺的关系极好，两人有如“良友”，经常讨论学问。吴敬梓当然会注意到其子的治学思想。再次，吴敬梓的至友程廷祚也是恕谷的学生，年青时就向往颜、李学说，从南京写信给住在北方的恕谷老人，说读了颜、李的著作以后，“始知当世尚有力实学而继周、孔之绪于燕赵间者”，极为倾倒。恕谷收到此信后大为高兴，称赞程廷祚“议论辉光，肆映如伟炬烛天”，认为是“此天特生之以使周、孔之传不至堕地者也”。^⑦戴望说程廷祚治学是“以习斋为主，而参与梨洲、亭林”^⑧是十分恰切的评论。吴敬梓与程廷祚交谊极深，时相过从，交流思想，讨论学问；《青溪文集续编》中还保存给吴敬梓的信，以及替吴敬梓姐姐写的墓志铭。因而，吴敬梓通过程廷祚接触到颜、李学说更是理所当然的。此外，吴敬梓还极有可能亲聆过恕谷的讲学。恕谷晚年有南迁传学之意，他曾说“金陵地廓人文，或可倡明圣道也”^⑨。正当此时，方苞因《南山集》一案牵连出狱后改隶汉军旗，须往北方，与恕谷约定相互交换南北田宅。于是恕谷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冬南下到江宁。这时，南京的一些学者如程廷祚、周崑来、张晓天、王符躬、李正芳、身在修、江素庵、翁止园、周侶樵、刘伊园、张钥门等人都向恕谷请教学问，如“翁止园问律吕”，恕谷也参观南京学者的研究成果，如“观身在修所造测量天地仪器”，对南京学者的研究著作也加以评价，如“观李正芳所著，正芳求为作题辞”^⑩。李正芳名师柏，南京人，他曾经向督学郑渔门“陈请，以习斋之学训士”。“郑渔门名钥，恕谷亦

与有往来”^②。在这段时间，吴敬梓之父卧病南京，敬梓侍医白下，经常往来大江南北。恕谷在南京的讲学盛举，吴敬梓极有可能参与其事；即使未曾与会，也当能从其亲友中知悉详情。从上述种种，可以知道吴敬梓接受颜、李学说的影响，并非偶然，而是有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的。

二

《儒林外史》是以批判八股举业为中心内容，从而触及到封建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所以研究颜、李学说对吴敬梓的影响，首先必须从颜、李的教育思想对《儒林外史》的影响谈起，再兼及其它有关方面。

在教育与生产的关系上，颜、李都认为教育的发展要建立在经济繁荣、国家富强的基础之上，教育则是培养人才从而使得国富民强的一种手段。颜元说：“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③这就是他们的政治纲领，而“举人才”——也就是教育，在他们的政治纲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于人才的培养教育，在他们看来，首先是“养”，然后才是“教”；首先是“预养”，也就是要在“薄税敛”，从而发展生产、“以足民食”的基础上，才能进行“预教”，达到“简师儒、申孝悌、崇忠义，以保民情”的目的。所谓“教以济养，养以行教，教者养也，养者教也。”^④将“养”和“教”相提并重，注意到生产的发展与教育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通过形象的描绘也表现了近似的主张。如嘉靖向庄绍光询问：“只是百姓未尽温饱，士大夫亦未见能行礼乐。这教养之事，何者为先？”之后，庄绍光“便把教养的

事,细细做了十策”,呈了上去。这教养十策的具体内容,虽然小说中没有具体写出,但只要 we 分析一下作者另一理想人物萧云仙的实践,就不难明白它的内容究竟是些什么。萧云仙在平定青枫城以后,首先“出榜招集流民”,“开垦田地”;接着“亲自指点百姓”兴修水利;然后“骑着马”到处劝农。这就是把恢复生产放在第一位。到了次年,生产发展了,“百姓们的日子有的过了”,他才考虑“只是这班小孩子……怎得有个先生教他们识字便好。”再三寻找,终于请到一个常州读书人沈大年来教书,把这些孩子“都养在学堂里读书”,一旦他们懂得道理、学得知识,萧云仙立刻加以抬举,“和他分庭抗礼,以示优待。”这不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发展教育的生动反映么?《儒林外史评》对此即加以评论说:“既有以养之,必思所以教之,坐言起行,方不愧儒者。”《卧闲草堂》本评者也同样认为,“萧云仙在青枫城能养能教,又能宣上德而达下情,乃是有体有用之才。”这些评论都肯定了萧云仙在青枫城对农民进行“养”和“教”的措施,也正反映了作者吴敬梓关于教育的发展必须在生产的发展基础上进行的教育思想。

在教育与政治关系上,颜、李都认为教育应该培养能巩固封建政权的有用人才。习斋说:“盖学术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② 恕谷也认为“……有人才乃有政事”^③。同时,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也应该有巩固封建政权的实际能力。习斋对“愧无半策匡时艰,惟余一死报君恩”的明代士人极为不满,认为“儒者不能将不能相,只会择将相”是极为可耻的,并且反问道,果然如此,则“将相皆令何人做乎?”^④ 恕谷也认为“我辈居官,立志为圣贤,出政效帝王,皆分内也。”^⑤ 这些言论都说明了他们对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见解,即教育应该培养人

才,而这些人才则要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效力。

吴敬梓关于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见解,也在《儒林外史》中通过所塑造的形象有所表现。例如他的理想人物迟衡山就认为教育的目的即在于“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替朝廷做些正经事”。杜少卿也认为“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在吴敬梓看来,教育培养的人才,既要能做宰相,又要能当将帅。做宰相,就要使得百姓能获“温饱”,引导士大夫“能行礼乐”。为将帅,则要象萧云仙那样能平定叛乱,或者象汤镇台那样能剿灭“目无法纪”的逆贼,维护“朝廷体统”。对于当时一些“地方官办事”,“件件都是虚应故事”以致“盗贼横行”,作者是十分不满的,通过庄绍光之口斥责他们“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对于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南昌太守王惠,作者极力加以辛辣的讽刺。对于把持朝政、结党营私的大学士太保公,作者也没有放过对他的讥讽。至于以举业为做官的敲门砖,如马二先生这一类的知识分子,作者也根据他们不同的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嘲讽。马纯上的读书做官思想,就是通过他自己一段言论表现出来的,他认为“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否则“那个给你官做?”对这种读书为了做官而不是为了有助政教的士人,吴敬梓是十分不满的,并加以讽刺、鞭挞。从作者对这两类人物一正一反的描写中,我们也就可以看出他实际上也是认为教育应该培养有助封建政权巩固的人才,与颜、李的主张仍然一致。

在教育内容方面,颜、李反对以八股举业为教育内容。习斋说:“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② 恕谷也认为用这样内容培养出来的人才只是谋取功名的禄蠹,而非谋求事功的干臣。他指出用八股举业对士人进行教育所造成的恶果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

且学正坏其所用，用正背其所学，以致天下无办事之官，庙堂少经济之臣。”^②在他们看来，应该以“六艺”作为教育的内容，颜元就说：“古者学从六艺入”^③。李塉也认为“教士之道，不外六德六行六艺”^④。他们说的“六艺”，也就是《周礼》所谓的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就包括了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例如六艺中的“数”就是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不过，李塉心目中的“数”，还包含了西洋输入的内容，他曾说：“吾人行习六艺，必考古准今。……数本于古，而可参以近日西洋诸法者也。”^⑤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有裨实用的学问，因而颜元主张教育内容应该包括“……数、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和“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技术科学，以至“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军事科学，还有“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社会科学在内。^⑥对这些学科的具体内容，恕谷还有进一步的阐说，如对于水学、火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他就作了具体说明：“……言水则凡沟洫、漕挽、治河、防海、水战、藏冰、醴榷诸事统之矣；言火则凡焚山、烧荒、火器、火战，与夫禁火、改火诸燮理之法统之矣。……”^⑦

这些主张对吴敬梓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他的理想人物迟衡山就认为“这举业二字原是无凭的”；但在反面人物鲁编修看来，只有做八股文的举业才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实实在在的“学问”。因而迟衡山愤怒地指责当时一般士子终日只知“揣摩”时文，不务实际，他说：“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用这些八股举业教育出来的又是些什么样人呢？举人张静斋把赵普与张士诚的事胡扯一起当作典故，进士范进不知苏轼为何人。他们有什么“德政”呢？张静斋居乡时，“没脊骨的事”就做得不少；到高要县打秋风，又替知县汤奉出主意把回

民老师夫枷死，激起“众回子心里不伏，一时聚众数百人，鸣锣罢市，闹到县前来”。范进才做了山东学道，为了报答老师周进的“高厚栽培”，主持生童考试时就意图徇私录取荀玫。但吴敬梓的理想人物却个个都象虞育德那样“不耐烦做时文”，重视有裨实用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王冕年青时就把“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虞华轩也精通“一切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之事”；杜少卿“祖上几十代行医”；虞育德也准备教儿子在“读书之余”“学个医”。由此可见，吴敬梓和颜、李一样，在教育内容方面，都反对空言无益的八股举业，都提倡有裨实用的实际学问。这样的主张，在当时无疑是很进步的。

此外，对于选士之法，颜、李反对科举考试，主张乡举里选，认为这样才能成就人才，有助政事。习斋主张：“治道不必文武分途，亦不必举人进士，只乡里选举秀才。秀才长于文德者，充乡约耆德之职；长于武略者，充保长职；其显有功德者，擢大乡长；……以至三公，皆通为一体，或次或递，或超擢。”^⑧他认为科举取士弊病太多，“今之制艺，递相袭窃，通不知梅枣，便自言酸甜。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应该变更这一陈法，“窃尝谋所以代之，莫若古乡举里选之法。”^⑨恕谷也认为八股取士的结果，将造成“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毒”^⑩的局面，也主张“……不行乡举里选，小学大学之法，不足以得人才。而不废科举，不能行乡举里选、小学大学之法。”^⑪其实乡举里选也不是最好的办法，他们自己也知道，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提不出更好的替代办法。颜元就说：“选举即不能无弊，而所取为有用之才；科举即使之无弊，而所得多无用之士。”^⑫两相比较，他们还是认为“选举”优于“科举”。这正表明他们不能理解政教制度只是经济基础的上层

建筑,无论科举考试还是乡举里选,同样都是腐朽的封建经济的上层建筑,都不能改变封建秩序走向没落的轨道。

吴敬梓对科举弊端的讽刺、揭露是通过形象的描绘表现出来的,例如主试大人的不学无术,应试士人的愚蠢无知;考试过程中买卖关节,贿赂公行,猜测试题,寻找枪手;取得功名以后出则为贪官酷吏,处则为恶霸劣绅,上不能定国,下不能安民。总之,在吴敬梓的笔下,科举取士之法,弊端丛生,积重难返。这与颜、李用政论语言的揭露是一致的。但对于乡举里选的取士之法,虽然小说中两次写到,却没有象颜、李那样不遗余力地鼓吹倡导。作品中先写安徽巡抚荐举杜少卿,杜以病辞。再写浙江巡抚荐举庄绍光,受到皇帝两次召见。在作者笔下,廷对时气氛庄严肃穆,作者也曾大声赞美“真乃旷典!”但吴敬梓毕竟是忠于现实的作家,庄绍光虽然廷对称旨,也仍然被放归乡里,一事无成。这就通过形象的描绘,从客观上暴露了所谓“乡举里选”、“征辟”、“选举”的主张,同样是不能改变现实的黑暗。不过,吴敬梓在小说中对此却没有作过多的讽刺、否定,这也说明即使在这一个问题上,吴敬梓也受到颜、李思想的一些影响。

总之,无论在教育与生产的关系、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教育的内容和取士的方法等方面,吴敬梓受到颜、李教育思想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当然,在《儒林外史》里,这种影响是通过作者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的发展自然流露出来的,不同于颜、李是用政论语言直接表述出来的。这在我们评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意义时,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内容,应该加以探讨。

三

颜、李都是封建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世界观中虽然有进步

的因素,但也存在着很多的糟粕,有着明显的剥削阶级烙印。他们提出的一些政治理想以及教育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大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政治措施和思想统治有着矛盾的一面,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又都是为了挽救封建社会日趋没落的命运,从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基础。他们倡导的礼乐兵农,其实质也就在于此。颜元讲得很清楚:“朝廷设官分职以为万民长,立法定律以防万民欲,人虽贤智,只得遵朝廷法律而行,所谓‘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做礼乐也’。”^④制礼作乐如此,兵农合一更是如此,所谓“有事则兵,无事则民”,“突然有事,随地即兵”^⑤,大都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雍正时观察使黄世发就把颜、李学说推崇为“周孔正传”^⑥,不是没有根据的。

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出身的作家吴敬梓,其思想意识也不能不存在着地主阶级的烙印。颜、李学说中这些落后保守的观点,也很自然的符合了吴敬梓思想中的落后一面。例如,他虽然对封建社会的某些黑暗面有所指责、揭露和批判,但其出发点却在于挽救它的颓运,是“恨铁不成钢”式的诅咒,并不是意图推翻这一“吃人的筵席”,正如前人所指出是“醒世”,而非仅“骂世”^⑦。因而在小说中对暴力反抗封建统治的行为,作者极为深恶痛绝,大加挞伐。例如对彭泽县知县缉拿抢盐的“凶神也似的人”不力,他即予以辛辣的讽刺;另一方面又通过庄绍光之口,斥责地方官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也就是镇压暴力反抗的方法。这种对比描写十分鲜明地表现了他的地主阶级立场。其它如郭孝子劝说萧云仙“出来替朝廷效力”,“博得个封妻荫子”,更是鼓吹读书人应该为加强封建统治效命。特别是对待敢于抢劫统治阶级“饷银”的赵大,作者先让他在山东道上被萧昊轩打得“抱头鼠窜”;还不放过,又让他在成都府被昊轩之子萧云仙打瞎双眼。这一情节的先后发展,正是作者地主阶级立场的

表现。此外,对于敢于不顾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自由穿戴衣着的演员如钱麻子、黄老爹等,作者不但通过鲍文卿之口对他们进行讽刺,还直接跳了出来,怒斥为“老畜生!”可见作者的封建等级意识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有流露。总之,在颜、李、吴的思想和著作中,固然表现了很大的进步性,但同样也存在着许多封建糟粕。

吴敬梓虽然受了颜、李学说的影响,但他的见解并不全同于颜、李思想。这是因为颜、李学说只是影响了吴敬梓思想的一个方面,他还接受了其它方面的影响,例如魏晋六朝时代的风尚和文学,等等。但更重要的还是他的生活道路,也就是他的社会实践所使然。仕途蹭蹬、不赴鸿博廷试、中年破产、移家南京,以致沦落民间,终生潦倒,从而接触到更多的下层人民,受到他们思想品德的熏染,使得他的思想能够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而有所发展,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许多方面已超出了颜、李学说的樊篱,较之颜、李的一些观点表现出更大的进步性。例如关于礼乐兵农的理想,尽管小说中也着力鼓吹,但也写出了它的失败的结局。倡导礼乐的盛况莫如祭太伯祠,但为时不久,王玉辉、邓质夫闻名而来时,祠中已到处“尘灰”,无人过问,乃至盖宽来游,更是山墙倒坍,楼板拆毁,“较王、邓游时又是一番景象,太伯祠至此收拾了毕,而文字亦结煞矣。”^④至于实践兵农最为集中的青青枫之举,萧云仙也被“任意浮开”的罪名,让“地方官勒限严比归款”,“家产都已赔完了”。最后,作者描写的这些倡导礼乐兵农理想的人物,“都已渐渐销磨尽了”;作者表彰的“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了。作品中这些形象的描绘,表明时代已经变迁,这些迂阔无当的理想并不能治疗当时社会的痼疾。迟衡山就说:“前代后代,亦时有变迁的”;盖宽更把祭太伯祠一举称之为“古事”,可见它们已不符合时代的需要。这也就在一定程